

归正之声

《教我如何不信他？》

6. 我不需要宗教

“宗教是教会为了软弱的人才设立的，他们不能面对生活的压力”

“我的生活平顺遂，不需要宗教。”

“为什么人不能独立生活？非得依靠宗教不可？”

这些说法在今日社会处处可闻。人们对基督教的态度，与其说敌对，不如说冷漠，认为与他们的生活与基督教没有任何瓜葛。他们不但对基督教漠不关心，甚至还大惑不解，为什么基督教那么强调“恩典”，还花那么多工夫又是查经，又是祷告。我们常听人说：“我真不懂，我过好每天的生活、作好份内的事、不犯法，不犯错、与邻居和平相处，这样还不能让神满意？为什么我非得做个『宗教人』？为什么我非得举止敬虔，有悔改、祷告这些外在的『宗教』表现？”

这些问题并非绕着基督教的枝节打转，而是说到了基督教的重心。神学本质就是恩典，对恩典缺乏了解，就根本无法了解基督教。

人本主义出了什么毛病？

基督教强调恩典而使一般人难以理解，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人本主义哲学对我们文化的影响。

人本主义有各种表现方式，不过无论它以何种方式表现，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强调人类德性的价值如勤劳、诚实、正义、爱心等，认为唯有高举这些德行，才能增进全人类普遍的福祉。人本主义者往往扮演自我牺牲的英雄角色，以增进人类的尊严与自由。从某些点看，基督教与人本主义很容易混为一谈，因为基督教对于人类的价值、美德与福祉也有很深的关注。不过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人类道德能力有不同的评估。人本主义者承认人不是完全的，他们了解人有可能做出各种残忍暴行。可是人本主义者仍确信，恶只是一种瑕疵，仅伤及人的表层。他们有把握人心基本上是善良的。只要人能达到一定的道德标准，就不必靠宗教给自己借口，解释自己为何没有达到这些道德标准。于是他们要人自我约束，埋头苦干、希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，至于祈祷、禁食这些敬虔举动就全免了。人本主义者的座右铭就是“神助自助者”。

富兰克林自传里有段叙述，很可以说明人文主义的道德观。富兰克林说到他有段时间决意要严格执行一个提升自我道德的计划。他把各样道德列成表格，每天记录自己各项道德的状态，监测其进展，希望这样可以达到诚实、谦卑、慈善、节俭等美德的高峰。他偶尔也会幽默道出这段历程的陷阱与挫折。他与谦卑搏斗的过程格外艰辛。比方说，他若一连三天都发觉自己在谦卑方面颇有成绩，他就开始骄傲。从此他才体会到，在追求谦卑的事上愈成功，他其实就变得愈骄傲！

可是人本主义者常面临一个难题，就是对于人类的道德期许常常“向下修正”。假如我们紧抓“人基本上善良”不放的话，就得把善良的标准从绝对变成相对，降低善良的标准，才能让“人基本上善良”的神话永垂不朽。“善良”的标准必须低到一般人都能经常做到。就在这一点上，人本主义与基督教产生正面冲突。

“我有心做好，也努力尝试”，这还不够？

基督教与人本主义之间的冲突，乃在于彼此对终极标准的看法有冲突。基督教衡量人的道德表现，不是取决于全国国民道德表现的平均值；如何定义善良也不是靠统计平均。基督教断言一个正常人是堕落的。善良的标准乃在于神的圣洁。基督教是持严肃的态度看待神的命令“你们要圣洁，因我是圣洁的”（利未十一45；亦见彼前一16）。人有神的形像，人的道德责任非同小可，不能用相对的善良标准把这重任弄得模棱两可。

耶稣有一次遇到一个有钱的少年官（参路十八18以下），这故事很生动的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相对标准。这少年官满腔热心来到耶稣面前问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，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（路18:18）。请注意耶稣的回答，他没有接受少年官的奉迎说：“谢谢你承认我是善良的。”他反而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”（路十八19）耶稣反驳他，因为他随便乱用善良这个字，耶稣责难他，并非否认耶稣自己的善良与无罪（这少年官显然还不完全了解基督），耶稣说这话的重点，是挑战这青年人对“善良”的假设。他对青年人说：“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作假见证、当孝敬父母。”那人说，“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”（路十八20，21）

“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”你想想他说的这些话，这个青年人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本主义者。他真的相信在他一生中他已经守住了神的道德律，他心中明显的在说：“噢！这一些就是我所要做的吗？好了，我在承受永生的事上是稳操胜券了。”耶稣在山上传讲宝训时，或许这青年人并不在场。在登山宝训中，耶稣明白说到道德律更深远的涵意，这青年人或许没有了解到，如果他看到妇女而产生淫念，就是犯了奸淫罪；他也没有理解到，恨他的弟兄就是犯了杀人罪。他保守自己不犯那些比较粗暴的罪，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是清白的。换言之，他把神律法的要求往下调整，使得神律法的标准降低了。

耶稣的回答有点技巧而间接。他没有对青年人说：“噢，你根本没有守神的律法，从今天早晨你一起床到现在，你都没有守神的诫命。”耶稣没有这样说，他说：“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（路十八22）基督为什么改变话题，从善良谈到金钱呢？我想这理由是很明显的。耶稣用这些话带出第一条诫命，“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”（出20:3）。来试验这少年官，而他并没有通过这头一条诫命，因为我们在23节念到：“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”（太18:23）

耶稣与财主少年的官谈话，主要的问题不是在于金钱，乃是在于善良。这个人希望得到永生，但却认为靠自己就够了，不要做个“宗教人”。他不愿靠着恩典来得到那属天的基业。

我们不是得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进天堂吗？

如果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恩典在基督徒生活中是那么重要呢？答案很简单：人无法凭着自己的道德进入神的国。人的善良不足以与神建立永恒的关系。

新约用大量篇幅清楚说到，我们在自我改造或道德重整上最崇高的努力，也不能满足神圣洁的要求。使徒保罗的宣告也一语道破：“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，因行律法而在神面前称义的。”（罗三20）

新约不但明说我们在义行上微弱的努力达不到律法的标准，甚至还直言，我们在道德上根本无力达到神的要求。这话是“忠言逆耳”。一言以蔽之，圣经说，我们无力做到所要求于我们的，“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”（罗八7，

8) 新约描述我们在本性上是属“肉体”的，在属肉体的情况下，人在道德上软弱到一个地步，行不出神的要求。

但若我们不靠恩典就不能行神的要求，那么神又怎么能叫我们为这负责呢？祂怎么可以要我们承担一个我们守不了的律法呢？别忘了律法要求完全，而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。神怎能在不完全的人中要求完全呢？

要了解这些疑难，我们必须先了解“不能”的意义。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之下说“不能履行神的律法”。

这个“不能”的问题，神学家已经和它缠斗有好几百年。爱德华滋（Jonathan Edwards）提出一项区分，对这样的讨论颇有助益。他把人“天然的能力”（natural ability）与“道德的能力”（moral ability）分开。“天然的能力”是指人作一件事情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或配备。要一个人去做道德的工作，他一定得要有道德的能力，比方说他必须要有意志（will），有心智（mind）。一个人若没有意志，就无法做道德的决定；一个人若没有心智，就不能用悟性响应道德的要求。这样，人若要能作一个有道德的受造物，就必须具备某些基本“装备”。假如神命令我们去飞翔，我们就办不到，不是根据道德的理由，乃是根据天然的理由，我们不会飞翔，并非因为我们是罪人，乃是因为神没有给我翅膀。鸟有自然能力去飞，人则无。人只能借着人为的机械方法才能飞。因此，如果神要人去飞，爱德华滋可能要说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，因为人没有飞的自然能力。

人是有自然的能力去做道德的事，因为他有自然方面的装备可以表现出道德的行为，可是圣经却说，人不能做到造物主对人的要求。爱德华滋称此为“道德上的无力”。人有心智，也有意志；但单单运用他的心智与意志就能顺服？还是他仍需要什么其它的东西？是的，他还需要在内心有某种对神的倾向。简单的说，他需要有讨神喜悦的“欲望”（desire）。爱德华滋主张当新约说人不能完成神的律法时，那并不是因为他缺乏意志与心智，不能明白神所要求的是什么；乃是因为人对神没有一个适切的倾向。人在堕落中，是在一种与神敌对、疏远的状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心所愿望的一直是邪恶的。圣经承认人有意志，但是这意志是在罪的“权势之下”，受罪的“捆绑”。

自由意志有什么好处？

爱德华滋把人的能力区分为天然能力与道德能力，正是切入到自由意志这历世历代的老问题。基督教告诉我们人有自由意志？我们既受罪的捆绑，如何能同时又有自由意志？这些问题与“为什么我们需要恩典”这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这些问题触及基督教与人本主义最基本的冲突。

假如按着本性我是被罪捆绑，我的意志在道德上又不能顺服神，那我又怎能为这些事负责任呢？这些问题牵涉深广，超过本书范围。但是有些关于意志的基本说法必须在此简单介绍。

从奥古斯丁到路德与加尔文，以至于现今的基督徒学者都一致主张，人的确是有自由意志，但他们对“自由意志”的理解与人本主义者截然不同。例如奥古斯丁论到自由意志说：“人有自由意志，但仍受奴役”；加尔文说：“人有自由意志，但被罪捆绑。”乍看之下这些神学家的观点似乎是矛盾的。到底他们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？

简单地说，神学家的意思是，人自由，因为他能选择他想选择的；进一步说，他们主张一个人不但有能力选择他想选择的，他也确实总是选择了他所想选的。所谓自由，就是能选择你想要的。其实我们总是自由的，因为我们总是选择了我们想要的。有时候看起来好象不是这么回事。有时我们好象是被迫去做我们所不愿的事，例如在路上我遇到强盗，用枪指着我说：“你要钱，还是要命？”在这种情形下，我

们的自由大大的受到限制，但也没有完全失掉。这歹徒是把我的选择减为两个。当然我不愿把所有的钱给那歹徒，但是那歹徒问我要钱或是要命的时候，我有一个确定的倾向，那就是“要命不要钱”。

做一个决定，整个相关过程很复杂。通常我们的选择不只两个。我们心中有许许多多的欲望（desire），这些欲望彼此纠葛，强烈程度也很少一致。有时候我有强烈的欲望要服事神顺服神，有时又信心软弱，无精打采，缺乏顺服神的热切。但有一件事总是不变，即我在做决定的刹那，总是根据我最强烈的倾向（inclination）。例如，假设我顺服神的欲望大过我想犯罪的欲望，那我就绝不会犯罪；另一方面，当我犯罪的欲望高过顺服神的欲望，我就犯罪了。虽然有许多人事物可以引诱我犯罪，但没有人强迫我犯罪。而正因为我是按着我的欲望犯罪，所以神要我为我的罪行负责。

关于自由，还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。

第一，若我果真总是按照我心中最强烈的倾向行事，而且我其实是非得按着我所倾向的去选择不可，这背后不是包含了某种“命定论”（determinism，译注：主张环境能影响人类行为的理论）吗？如果我的选择是受我的倾向控制，那么我能说我是真自由吗？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？自由是扯不上哪种命定论的。但在作道德的决定时，关键在当事人自己，我们称此为自决（self-determination），这是自由的本质。命定论是一种主义，这主义的理论是把人降低到完全受外力控制操纵的地步。自决与受外力影响的命定论是完全对立的。

第二个问题，是与“我们总是按照心中最强烈的倾向作选择”有关；这问题是说到，为什么我们对神没有正面的倾向。如果说我们一定要先有对神的倾向，然后才能顺服神，而我们又缺乏这样的倾向，那神怎能要我为这事负责呢？分析到最后，“道德上倾向神”是“顺服神”的先决条件，正如“有翅膀”是“能飞”的先决条件。我们没有顺服神的欲望，而到头来圣经却说我们不能“顺服”神，我们怎能为此事负责呢？圣经清楚的说到，我们必须为不能顺服神负责，我们被判定为有罪，乃是因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时，他也代表我们犯罪了。

我们生在一个败坏的境况中，却要为身处败坏的境况负责任。然而，我们堕落，并非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乃是因为亚当替我们做的。这就成为神学上很棘手的问题，即所谓“外来的罪孽”（alien guilt）。这样又生出一个问题，即在我出生很久以前，有一个人犯了罪，现在神叫我因他犯的罪负责。一位公义的神怎能做这样的事？

我没做过的事，为什么要找我算帐？

这些问题很难用这么短的篇幅说清楚，但大致浏览一下可能还是有帮助。我略略了解法律在什么情况下会要我因为别人作的事负责。比方说，我如果和一个杀手同伙去暗杀一个人，我就有可能被控一级谋杀罪。尽管我没碰凶器，案发时离现场也很远，但我仍然被认为有罪，而且有罪的程度和我亲自扣下扳机没有两样。我要为那被雇来代表我杀人的杀手负责。

可是谁雇了亚当呢？我要向神大声说“谁说亚当代表我犯罪？这样说既不公平，也不恰当。我应该无罪”。我从来没有和亚当同谋过啊。我不但没有在犯罪的现场，我那时甚至还没生下来。或许亚当代表我，但在选择要谁代表我的事上，我却没有发言权。假设人民要求王要有一个人代表他们争权益，而王却指派自己的亲信做人民代表，那人民必定说这是暴政，并要求自己有选举权，选出代表他们自己的人来。“选举”（vote）是从拉丁文votum来的，与选择和愿望有关。我要选择自己的代表者，如此我的愿望才能得到公正的表达。

为什么我要一个“公平”（fair）的代表？因为我们要确定我们的代表能准确陈述我们的意愿。如果我们的代表者是由别人指派，我们就不能担保这人会为我们争取最高的权益。其实，即使我自己选择的代表都未必能按我的心愿行事。

每次我选择人代表我，我的选择都可能未臻完美，而选出来的人也不能百分之百代表我。但在整个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人被选来代表我，是真的百分之百代表了我。这事发生在伊甸园。没错，那是神替我做的选择，我可以不服气，但我仍必须面对这个问题：“神替我选的代表，和我自己选的代表相比，哪一个代表性更准确？”如果我们说神的选择未臻完美，这就轻慢了祂的公义，且反倒证明祂选的真准。如果我控诉神是暴君，认定要是给我机会，我会别有他选，这就又只能显出亚当堕落后传给我的败坏。这样一来，亚当的堕落是集体的堕落，亚当的犯罪是集体的犯罪，我也有份于其中。我有犯罪的倾向是我自己的错，我不能把这事怪到亚当身上，或是神身上。

基督徒相信人是堕落的，但是仍有自由按他的喜好行事。因为他的喜好是败坏的，所以人缺乏道德能力去顺服神。只有借着恩典，这样堕落的人才能得到救赎。不靠神的恩典，不论人怎么努力，也注定无法达到道德的完美。

人本主义与基督教的自由观有什么不同？

人本主义的自由观，倾向于认为人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。一般流行的观念是这样：当我们面临道德选择时，我有能力选择行善或不行善，没有任何“先天倾向”（predisposition）左右我行善或做恶。我的选择完全是自发的。照人本主义者的说法，有先天倾向就没有自由；照基督教的说法，没有先天倾向才没有自由。

假设我面临一个选择，但是绝对没有行善或做恶的倾向，那么我会选择什么？为什么我会选择它？更重要的是，我要凭借什么在二者中选其一？我的选择会变成是无因之果，这是非理性的。假如我的选择是没有理由的，那么我的选择就完全是任意而为，没有道德价值。人本主义者有一个双重难题。第一，他不能解释一个“自发”的选择是怎样产生的；再者，即使这样非理性的行动果真发生了，他也无法赋予它任何道德意义。

人本主义非但不合乎理性，在历史上也说不通。假如人生下来在道德上就是中立的，我们又如何解释人类的不完美是普遍而全面的呢？往往人对这问题的回答是：“因为社会是败坏的，而道德无辜的人，生在这败坏的社会中，就受到罪恶的熏染。”这样的理论是肤浅的。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就把这理论戳破了：“那么起先这个社会是怎么变坏的呢？”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每个成员的道德都完全？为什么即使半数成员道德完全的社会也没有？即使圣经从来没有提过原罪，我们光是研究历史和人类社会，也很容易推论出人有原罪。

我为什么需要恩典？

为什么需要恩典？乃是为了得释放，与神和好。没有恩典，我就处于堕落的境况中，我必须面临神的审判，而这审判乃根据我的表现作出判决。

末日的审判这观念，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不受欢迎，也不常谈论的。传道人也不像从前那样常常传讲地狱，火湖及被定罪。当下最盛行的观念是，进天国再简单不过了，只要一死，就自动进天国了。人们认为神是“慈爱”的，且慈爱到一个地步，其实祂不那么在意我们是否守祂的律法。律法摆在那里引导我们，但如果我跌倒了，坠落了，我们的老天父就只眨眨眼说：“孩子总是孩子嘛。”我们所期待的，就是

神看着我们，或是根本不看我们，眨眨眼发出宽容的微笑说：“噢，好吧，人都是不完全的。”

我们的问题是：我们因为与罪同伙所以无份于神的圣洁。既然我们都不完全，因此就认为这样的不完全无关紧要。我们期待神看大家都没及格，就把分数开根号乘十，或是只当掉全班最后几名。即使神要我们对我们的生活负责，祂也一定会从宽处理吧。我们犯罪虽多，却都不太严重，神绝不会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罪处罚我的。这些假设很危险，这些劝告会害你。何以我们没能看出我们切实需要恩典，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为人行事的价值观与神的价值观截然不同。假如有人要我们写出十项最重要的法则，藉以治理全国，你想会有多少人将“孝敬父母”列为最绝对的命令？会有多少人把“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”列为最高的法则？又有多少人会认为应该明令禁止妄称神的名？我们优先级和价值观就是无法与神相合。

我再用另一种方式说到价值观的冲突。试想最重要的道德责任为何。神告诉我们，最大的诫命是“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神，并且爱人如己”。这个命令让人肃然。你知道有谁尽心爱神吗？又有哪个是尽意的？我们有无比的热切想要认识神，并且殷勤严谨地研究祂的道吗？你认识有谁爱世上每一个人像爱他自己一样吗？我不知道别人，但我知道我自己一生当中没有超过一分钟全心全意的爱神。

没人能遵守最大的命令，所以这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吧。如果这条律法无人能守，事情应该就没那么严重了吧。可是神说这是最大的命令。我们且这样想：如果违反这命令就是最大的过犯可怎么办？如果我们至终要受这律法的审判，那又怎么办？到那时我们是不是需要恩典呢？

试想这伟大诫命的含意。这条律法好不好呢？假如我们都完全守住这个律法，那一切的忌妒、虚伪、盗窃、与残暴都将从这世上绝迹，没有人会欺骗谗谤或逼迫他的邻舍，神将在各处得到尊荣，公义与爱心将到处可见。我们没能守住这条律法，并不仅仅意味我们失去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，而是意味着我们所犯的罪，不下于一个宇宙性的叛乱。我们稍稍犯罪就是背叛了创造天地的主。就着这点看，我们是悍然抗拒祂的权柄，祂的治理。神对于这种事绝不含混带过，也不等闲视之，而是亲自审问每一个人。

不过别怕。我们有安全网。我们思想神的律法时不必过度惊慌，因为知道神是慈爱的神，祂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个人结果是沉沦灭亡。

现在我们谈谈恩典，我们听说神是恩慈的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我想我们是需要恩典没错，但我还是不需要任何型式的宗教信仰，因为神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了。他非得把恩典赐给每个人，因为祂是慈爱的。慈爱的神不容许任何人灭亡。这爱岂不使神非得将恩典毫无分别的赐给每一个人吗？人提到恩典可以有很多种谈法，但这种谈法是最危险的。

神的恩典尽管丰盛，又真是奇妙，尽管祂的恩典是白白赐下，又如此浩瀚；可是我们绝对不可视为当然。没有什么能迫使神非得有恩典不可，即使祂的爱也不能。神向我们施恩，不需要任何的条件，就是祂向我们所施的慈爱，也不需要任何条件。如果恩典是神被要求非给不可的，那就称不上恩典了。神是不能被要求的。如果我们配得，那就不是恩典了；如果神有义务将恩典给我们，那么这也不是恩典。我们若以为神非施恩不可，我们是把恩典与公义混为一谈了。我们所犯最令人害怕的错误，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认为，神不知怎地“欠”了我们恩典，意思是祂必须要向我们施恩。当我们开始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回头，研究一下律法。一旦我背叛了神，神丝毫不欠我什么。我绝对急切需要神的恩典，不然我必灭亡，但我绝不能要求祂一定得把恩典给我。

我们不是要作一个惯用宗教术语、穿着特定服饰、挂上甜蜜笑容的“宗教人”。但我们确实要作一个完全依靠神的恩典，殷勤运用神为我们预备恩典媒介的“宗教人”。对神来说，悔改、相信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，神的恩典也伴随着要求。对经历过神赦免之恩的人来说，这些要求乃是机会，让我们可以表达

对神的感恩。我们对神恩典的响应就是顺服，顺服的动机不是进天国，乃是尊崇这位早已让我们进入祂国度的大君王。基督教神学的总括就是恩典。基督教伦理学的总括就是感恩。

重点摘要

一. 人本主义者不需要宗教，因为它深信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。人本主义虽与基督教有许多相同的价值观，可是人本主义对“善良”的观念与耶稣对“善良”的观是正面冲突的。人本主义的善良标准，必须相当的低，才能让一般人赶得上；而神的善良标准是完全的。

二. 有钱的少年官在他寻求救恩的事上失败，是因为他“良善”。他不愿意靠恩典来得永生，耶稣告诉这青年人，在他一生当中，没有守全神的命令。耶稣借着要求他变卖所有的来跟从，证明他没有守全律法。因为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，就是第一条诫命——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青年人无法这样做。如果他不能靠自己的义行来得永生，他就不要得永生了。

三. 神向不完全的人要求完全。我们不能完全，因为我们没有“道德上的能力”使我们完全。我们可能有“自然的能力”使我们完全，因我们有一切必须的装备，但我们在道德上不倾向神。

四. 人有自由意志——我们能选择我们所要的。我们犯罪因我们想要去犯罪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按照我们内心最强烈的倾向行事。

五. 我们要为亚当的罪“负责”，因为亚当完全代表我们。我们生在一个堕落的境况中，被捆绑而败坏。因为我们也堕落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恩典。

六. 神从来不亏欠我们恩典。恩典并非公平。如果神最后单以公平对待我们，我们就要灭亡了。

（选自《教我如何不信他？》，本文收录在《史鲍尔文集》里）